

中国当代 话剧论稿

倪宗武 著

ZHONG GUO DANG DAI HUA JU LUN GAO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本书对建国四十多年来当代话剧的总体面貌、发展轨迹，重要作家的艺术特点、成败得失，以及特定阶段的创作现象、戏剧思潮……等能够进行实事求是的梳理、剖析与理论研究。

本书视野开阔、内容充实、立论客观、公允，对广大话剧爱好者，特别是戏剧工作者与高等院校的师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纪双鼎

序

张 炯

话剧原是西方的舶来品。自本世纪初引进我国，成为现代戏剧的重要形式，与我国传统戏曲分庭抗礼。在“五四”以后，话剧运动更风起云涌，尤其是抗日战争八年期间，话剧活跃在前线与后方，对动员人民群众起来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新中国建立后，话剧更有巨大的发展，作家辈出，剧作如云，成为当代文学领域最重要的体裁之一。它不仅擅长表现现代题材，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历史题材的作品以及丰富多彩的儿童剧。话剧由于采用当代生动活泼的口语，通俗易懂，老少咸宜，不但城市观众喜欢，据好多剧团到农村演出的实践证明，广大农民群众也是能够接受和欢迎的。今天，即使话剧也受到影视等电子艺术的挤压与挑战，然而许多城市小剧场话剧的走俏，说明话剧仍然具有很大的生命力。我相信话剧象其他语言艺术一样，也肯定会有广阔的前途的。

今年三月，倪宗武同志告诉我说，他的论述我国当代话剧的著作要出版了。他希望我为这部著作写篇序。自然，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因为，我不但认识倪宗武同志多年，而且彼此还在话剧研究方面进行过合作。记得在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想开展关于当代中国话剧文学的研究，曾邀请几位大

学教师一道做这工作。其中就有当时还在河北师范大学教学的倪宗武同志。这个课题后来由我负责，协作中就和倪宗武同志有过多次接触，深感他为人的忠厚朴实和治学的严谨、勤恳。他为此课题承担了多章写作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其中就有收在这个集子中的《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一文。阅读他撰写的章节，当时我就很敬佩他收集材料的广泛翔实和论断的稳妥恰当。如今，检视他这本著作的篇目，就不难看到他对于我国当代话剧的发展，确有相当精彩的见解和相当全面的把握。全书上编属于对我国当代话剧发展的宏观性描述和探讨，如《试论当代话剧的三次高潮》便需要对中国当代话剧的数十年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才可能下笔，这样的文章象《中国当代话剧发展概览》一样，没有丰厚的积累是无法驾御的。《“复苏期”话剧创作一瞥》、《八十年代戏剧探索得失谈》是描述一定时期话剧概况的文章，而如《也谈“第四种剧本”》、《当代史剧创作论》、《新中国儿童剧管窥》和《新时期“社会问题剧”纵横谈》则都属论析特定题材的戏剧创作现象的专论。此书的下编则属对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作微观研究与探析的论作。如《老舍剧作论》对当代在话剧创作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老舍先生的话剧创作历程及其成就得失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田汉建国后的话剧创作》与《漫谈曹禺的三部剧作》对现代我国话剧奠基人之一的田汉以及我国话剧史上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的曹禺为新中国话剧所作的创作贡献作了评介；其他象《“京派”、“海派”话剧寻踪》、《新时期话剧人物谈》、《当代“话剧危机”思考》、《评“沈话现象”》等，或从话剧创作流派的视角，或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视角，或从地区性话剧现象的视角，或从话剧整体发展中某一问题的视角，对有关论题阐述自己不无独到的见解。《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一文更对新中国成立后对历史剧的几次讨论作了相当客观而剀切的评述，对有兴

趣的读者了解这些论争很有帮助。全书最后还附有《中国当代话剧要目索引》，这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为专家和广大读者全面了解新中国的话剧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于此也可见倪宗武同志在研究工作中如何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总之，在中国当代戏剧的研究中，无论对话剧、歌剧或传统戏曲都需要有更多的人做更深入的研究工作。在加强文学评论的努力中，也更需要加强戏剧的评论，以促进各种戏剧门类的发展和繁荣。因此，倪宗武同志关于话剧研究和评论的努力，也理应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我祝贺他这一本著作的出版，并祝愿他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做出更大的成绩，产生更丰硕的成果！

一九九六年六月六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目 录

序.....	张 炯 (1)
--------	---------

上 编

中国当代话剧发展概览	(3)
试论当代话剧的三次高潮	(17)
也谈“第四种剧本”	(29)
“复苏期”话剧创作一瞥	(37)
八十年代戏剧探索得失谈	(47)
当代史剧创作论	(62)
新中国儿童剧管窥	(75)
新时期“社会问题剧”纵横谈	(83)

下 编

老舍剧作论	(99)
田汉建国后的话剧创作	(118)
漫谈曹禺的三部剧作	(135)

田汉 1958 年剧作比较	(145)
重读《关汉卿》	(154)
“京派”、“海派”话剧寻踪	(167)
新时期话剧人物谈	(178)
当代“话剧危机”思考	(186)
评“沈话现象”	(198)
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	(210)

附 录

漫谈学习中国现当代话剧作品	(223)
中国当代话剧要目索引	(233)
后 记	(258)

上 编

中国当代话剧发展概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已进入崭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也标志着作为社会主义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当代文学从此开始了。

中国当代话剧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一翼，它与当代小说、诗歌、散文一样，至今已走过46年曲折发展的道路，虽历尽风雨、坎坷，但就总体而言，成就和影响是巨大和突出的。它不仅造就了一支有一定规模的、经得起斗争考验的成熟的剧作家队伍，而且还产生了象《龙须沟》、《茶馆》、《关汉卿》、《蔡文姬》、《万水千山》、《红色风暴》、《霓虹灯下的哨兵》、《枯木逢春》以及《丹心谱》、《于无声处》、《王昭君》、《报春花》、《陈毅市长》、《绝对信号》、《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等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佳作。

中国当代话剧成就的取得除了得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确的指引，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有力推动以及广大剧作家辛勤劳作与人民大众热情支持外，也还与它们继承、发扬“五四”以来我国现代话剧的优良传统，并从我国悠久的古典戏曲和外国进步戏剧中吸收丰富营养是分不开的。

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如果从本世纪初留日学生组织“春柳社”算起，至今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如果说成熟的话剧文学创作，那时间就更短了。但是，就是这一被人称为“舶来

品”的话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并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被中华民族所拥有，同时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其关键则在于它一开始就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的确，中国现代剧作家，象田汉、洪深、欧阳予倩、郭沫若、曹禺、夏衍、吴祖光、于伶、宋之的、陈白尘等等，他们不仅在成功地引进、完善、丰富话剧这外来艺术样式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更重要的是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为中国现代文坛提供了一系列富有艺术魅力的话剧精品。这些精品不仅在追求话剧民族化、大众化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而且在密切关注火热的现实斗争、积极反映人民大众的意愿等方面也作了不懈的努力，因而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战斗作用。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优良传统，而中国当代话剧文学恰恰在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反映新时代、表现新人物，帮助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方面，立下了不容抹煞的功绩。至于说到向古典戏曲与外国进步戏剧学习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当代话剧学习中国戏曲人民性的优良传统、写意性的表现手法、灵活性的时空处理，以及熔诗、剧、舞为一炉的独特的民族风格，同时还从外国著名戏剧作家、戏剧流派的成功经验中吸取营养，象突破“镜框式”，推倒“四堵墙”，不再仅仅以制造“舞台幻觉”为唯一目的，有的还插入作者主观的介绍、评述以造成间离效果以及象征、荒诞手法的借鉴运用等……这一切也是中国当代话剧文学取得丰硕成果的保证。

回顾建国46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变迁，探寻当代话剧创作的自身特点与发展轨迹，我们发现，中国当代话剧文学创作大体经历了以下五个发展阶段：

一、中国当代话剧起步阶段（1949—1957）

在这一历史阶段，“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① 新生的共和国生气勃勃，一片兴旺。

新的时代赋予当代剧作家新的更加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沸腾的社会生活则要求他们的作品具有更加符合人民需要、符合社会主义需要的内容与形式。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戏剧工作者努力学习政治理论、热情投身现实斗争，他们都深深地被这场刚刚结束的革命战争所激动，被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吸引，被不断涌现的动人业绩所鼓舞，满怀激情地歌颂祖国的解放、歌颂人民的翻身、歌颂建国后一系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歌颂人民群众在得到翻身解放，成了国家主人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热爱新生活、保卫新生活、建设新生活的巨大政治热情和崭新的精神风貌。可以这样说，反映新生活、歌颂新生活，已经成为这一阶段话剧创作的总主题，即使是那些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剧作，人们也可以透过作品感受到作者对新社会、对新生活强烈的追求和无限的憧憬。

的确，这是个颂歌的时代，广大剧作者，不论是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还是来自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也不论是经验丰富的剧坛前辈，还是刚刚提笔的业余作者，他们都由衷地唱起了时代的颂歌。尽管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对这些“颂歌”提出不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

只一条的缺点和毛病，诸如不少剧作题材内容过于狭窄、艺术手法比较稚嫩、人物形象还嫌单薄……但是，它们毕竟反映了作者在生活第一线的切身感受，因而虽然粗糙，但不虚假，而且还产生了象《龙须沟》（老舍）、《战斗里成长》（胡可）、《考验》（夏衍）、《明朗的天》（曹禺）、《万水千山》（陈其通）以及《在新事物面前》、《钢铁运输兵》、《红旗歌》、《四十年的愿望》、《春风吹到诺敏河》、《妇女代表》……等等影响较大的佳作。这些剧作的出现，鲜明地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当代话剧已经开始，也还证明那种认为：解放了，“从此是秧歌、腰鼓的天下了，话剧没有前途了”的怪论是没有根据的。

特别到了1956年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解放了作家的思想，并大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活力。因而1956、1957年间，当代剧坛涌现了一批被称为“第四种剧本”的作品，象《同甘共苦》、《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新局长到来之前》、《被遗忘了的事情》、《归来》、《葡萄烂了》……等等。这些作品敢于突破、有所创新，一方面大胆地干预生活，尖锐地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矛盾与弊端；另一方面注重描写人物多方面的生活，除了社会生活之外还大胆涉及人物的家庭生活、个人生活、感情生活，尤其注重剖析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因此，它们的出现不仅对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开拓作家的创作视野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还给建国初期的剧坛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与繁荣的气象。

还应当提到的是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我国话剧史上的一次空前盛会。参加大会的有全国41个剧团、两千多名话剧工作者。大会不仅检阅了建国初期话剧艺术的成就，而且还总结交流了话剧创作、演出的经

验、探讨了话剧艺术的发展道路……它是新中国话剧初步繁荣的标志，对促进当代话剧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当代话剧发展阶段（1957——1966）

1957年至1966年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①的十年。这十年我们国家的各项工作既取得显著的成绩，也遭到严重的挫折。一方面，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发展了经济、增强了国力，培养了骨干、积累了经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步向前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②，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58年的“大跃进”，59年的“反右倾”以及62年以后“左”的偏差的严重发展，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可以说这十年是我国人民在坎坷的道路上，克服困难，曲折前进的十年。在这一阶段，当代话剧创作也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现状。

首先，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自上而下地强调文艺要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就直接导致了本时期剧坛出现了大批从不同生活侧面反映形形色色阶级斗争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直接取材海防民兵歼灭美蒋特务的战斗业绩；有的重点揭露地富分子无孔不入的破坏活动；有的是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制高点来反映两个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问题；还有的则从日常生活入手，甚至从儿童课余活动中透视、寻觅阶级斗争的踪影……可以说，在话剧作品中注入阶级斗争的内容已成为这一时期剧作家普遍的追求与检验世界观是否得以改造的重要标

① 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6页，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

志。虽然这些剧作在当年大多得到极力的推荐和较高的评价，但是现在看来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并在艺术上有建树的成功剧作并不太多；大量出现的则是瑕瑜互见、良莠杂陈，并明显带有阶级斗争扩大化时代印记的作品……

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时期的剧坛，一方面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共产风”、“浮夸风”等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以致反映现实题材的剧作遭受重大的挫折，不仅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受到严重的破坏和削弱，而且还滋长了粉饰生活、图解政策、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恶劣倾向。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双百”方针的贯彻虽然障碍重重，但它毕竟深得人心，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广州会议”又对这时期的话剧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再加上广大剧作家总结五十年代创作的经验教训，艺术上也有新的长进，因而好剧本仍时有出现，如《枯木逢春》（王炼）、《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等）、《第二个春天》（刘川）、《南海长城》（赵寰）等便是代表。特别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历史题材剧作的丰收则构成了这一阶段话剧创作又一鲜明的特色。象《神拳》（老舍）、《关汉卿》、《文成公主》（田汉）、《蔡文姬》、《武则天》（郭沫若）、《胆剑篇》（曹禺等）、《甲午海战》（朱祖贻等）、《孟丽君》（丁西林）以及《红色风暴》、《最后一幕》、《东进序曲》、《兵临城下》、《豹子湾的战斗》、《杜鹃山》、《七月流火》……等等。这些剧作的出现不仅迎来了中国话剧创作的再一次繁荣，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中国剧作家面对左倾逆流依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依然倾心于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繁荣的可贵的敬业精神的有力佐证。

三、中国当代话剧停滞阶段（1966—1976）

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我们国家革命

与反革命大搏斗的十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边缘的十年，是全国各族人民遭受骇人听闻浩劫的十年，同时也是中国当代话剧悲惨的十年。在这十年里，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他们所篡夺的领导权，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反动统治。他们以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纲领，全盘否定17年的文艺工作，不仅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把党对文艺的领导诬蔑为“黑线专政”，而且还疯狂地扼杀几乎所有古今中外的进步文艺作品。他们一方面自我标榜、自我吹嘘，将自己装扮成戏剧改革的倡导者、组织者，另一方面则篡改、歪曲毛泽东文艺思想，到处宣扬诸如“三突出”、“三陪衬”、“主题先行”之类的“帮规”、“帮论”，把戏剧创作引入反现实主义的魔道；他们一方面别有用心地叫嚷，“话剧已经死了”，另一方面则解散剧团、封闭剧院，迫害几乎所有正直的戏剧工作者，致使话剧舞台成了不毛之地。

在这一时期屈指可数的话剧创作中，除了一些是非颠倒、内容虚假、手法卑劣，极力为“四人帮”一伙歌功颂德，美化极左路线的剧本，如《盛大的节日》、《战船台》、《风华正茂》、《宣战》等将作为反面教材写进中国当代话剧史，以便给后人以警策之外，其余的，还能够在话剧发展历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或是至今仍有思想意义与审美价值，能给人们以借鉴与启迪并值得一提的剧本，客观地说是一部也没有。这确实确实是中国当代话剧发展史上的停滞阶段。

四、中国当代话剧复苏阶段（1976—1980）

1976年10月中国人民赢得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政治动乱，从而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新时期，广大戏剧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道以极大的热

情投入革命和建设工作的行列。他们一方面愤怒地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推倒反动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另一方面则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以自己辛勤的创作为社会主义话剧事业的复苏与繁荣奉献力量。

复苏期的话剧创作，在刚开始阶段还未能完全摆脱错误思想的束缚，有的英雄人物身上仍然可以看到“三突出”的印记、“高大全”的影子。但这种局面很快便得到改变。以《枫叶红了的时候》为开端，以《丹心谱》、《西安事变》为标志，中国话剧又恢复了忠于现实生活、表达人民心声、反映时代足迹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以及文艺界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昭雪……使得话剧创作恢复了声誉并获得好评。

复苏期话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在题材的突破与主题的开掘方面较过去有了明显的进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剧坛迅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其中既有描写民主革命历史，也有反映古代历史题材；既有描写十年动乱中青年一代的思考与成长，也有描写新长征途中的斗争生活；此外，还有描写爱情生活、描写国际斗争，歌颂中日、中美人民的友谊……等等。特别是“揭批‘四人帮’、歌颂‘老一辈’”已成为这一阶段话剧创作的主要内容。广大剧作者满怀激愤的心情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无情地鞭挞了这伙丑类肮脏的灵魂，有力地反映了革命人民在逆境中的英勇抗争。象《枫叶红了的时候》（金振家等）、《丹心谱》（苏叔阳）、《于无声处》（宗福先）、《神州风雷》（赵寰等）、《有一个小院》（李龙云）等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此外，有的剧作者还针对林彪、“四人帮”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种种攻击与诬蔑，创作了《曙光》（白桦）、《西安事变》（程士荣等）、《报